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完善路径

沈协¹, 陈宇²

(1.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 福建 厦门 361026)

[摘要]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灵活性等天然优势, 应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功用。然而, 通过对X市J区辖区内37个村居走访调研发现, 现阶段村规民约存在规范性、内生性、针对性和适用性不足等诸多问题, 加之当前乡村仍未向村民自治和规则化治理的趋势进行充分转化, 导致村规民约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用价值。基于乡村规则化治理的需求, 应当优化落实村规民约效用发挥的乡村治理环境; 同时, 应当从生成路径、规范表达、实践内涵和规范面向等4个方面对村规民约进行改造, 推动村规民约的司法裁判功能重塑, 注重村规民约对乡村治理特点的回答,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功能。

[关键词] 村规民约; 乡村治理; 村居自治

[中图分类号] D 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4-0015-07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3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

社会治理的基础是社会规则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 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当前, 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提出了加强社会立法、紧贴乡村实际“造法”的要求。村规民约因应治理规则的需求, 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效用, 指的是发挥村规民约应有的对村民行为的规范功能, 进而产生对乡村事务的治理作用。

村规民约既是历史悠久的村治形式, 也是中

国本土特色的法律文化创造。改革开放以来, 村规民约在推进村民自治、乡村法治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作用显著。2018年12月, 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发布的《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 到2020年, 全国各地都要普遍建立起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让全社会特别是基层, 对百姓身边的事有共同的遵循, 把身边亟待解决的事处理得更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具体要求, 也是乡村治理的目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新时代背景下, 理顺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既有加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也具有法律文化价值^[2]。

二、村规民约发挥乡村治理功能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反思

(一) 现实困境: 村规民约的内生缺陷与规范不足

笔者收集了X市J区所辖的37个村居的村

[收稿日期] 2023-09-11

[基金项目] 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JSZM2021028)

[作者简介] 沈协(1988—), 男, 广东汕头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海商法、智能科技法研究。

规民约,并仔细分析。通过对37个村居的规范文本分析,发现目前村规民约存在规范性、内生性、针对性和适用性不足的问题。

1. 大多数村规民约篇幅简短,内容宽泛,条款主要由宣贯性规则和引用类规则构成,规范性不足,具体体现在:(1)规范领域有限,规范面窄,如多数村规民约只涉及婚丧嫁娶等内容。(2)规范内容简单,部分村规民约篇幅短,只有零星几个条文。(3)规范目的主要以道德宣扬为主,而非具体实施,如直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良家风、邻里关系处理原则作为村规民约的条款写入,而未通过规范细化这些原则;或者直接复写、摘抄法律法规的原文作为村规民约的条款,村规民约对法律法规的拓展性难以展开,导致其适用性弱。(4)规范条文本身缺失法律规范应有的构成要素,如缺失行为的法律后果,导致实践中难以适用。如此规范性较弱的村规民约无法作为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失去了应有的行为规范功能和乡村治理功能^[3]。

2. 村规民约主要的生成路径以自上而下居多,大多数村规民约未经村民集体决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根据法律法规,村规民约的制定权属于村民集体,换言之,村民是村规民约生成的内部动力。但是,调研中笔者发现,多数村规民约并非由村民动议制订,而是由村两委起草或者引入专业人士及村民共同起草,并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甚至出现即使村民通过,很多村民并不知悉或不关注村规民约的内容。申言之,大多数村规民约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生成路径,背离了村规民约的应有生成路径。由于生成路径本身实际脱离了村民,导致即使存在村规民约,也很难在村民内部产生实际的规范效力。

3. 不同村居的村规民约内容上基本一致,个体差异性不足。在制订村规民约时,部分村居主要借鉴其他村居的村规民约,而忽视基于不同村居的差异对村规民约作出调整,未能在村规民约中体现出本村居自身的特色,导致村规民约对村居的实际生活针对性、指导性不强,与村民产生了较大的距离感。

4. 村规民约在实践中可适用性和操作性不强。这是村规民约的内生性、规范性与针对性不足的必然结果。村规民约长期被漠视而未被适用,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也就无法成为指导村民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摆脱不了被束之高阁的命运。

上述村规民约的不足,体现了当前村规民约的成约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规范功能无法突显,借助村规民约来达到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消解和乡村治理的基础尚未形成。

(二) 原因反思:村规民约面临的乡村治理环境

村规民约之所以存在前述的规范性、内生性、针对性和适用性不足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下,乡村缺失村规民约赖以生成并发展的土壤,进而影响村规民约受到应有关注。

1. 传统村级治理模式的惯性。(1)乡村治理任务的自上而下的传导与宣贯。乡村基层组织承担着乡村治理的压力和任务,不仅承担各类乡村管理职责,而且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同时还面临上级党委政府的考评与监督。乡村公共事务通常由村干部自上而下地传导与宣贯,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与运行的常见模式。乡村治理主要依靠村委及村干部,这种长期以来建构的乡村权威的治理结构和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虽然乡村发展受到了城市化的冲击,但是乡村治理仍沿袭着传统的村级治理模式,依靠村集体组织或村干部的带动,村民消极被动地参与乡村治理事务。(2)乡村矛盾纠纷的调处以非规则治理的模式展开。随着乡村城镇化发展,传统村级治理模式会产生诸多矛盾。比如,乡村事务的逐渐繁重,治理无法触及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治理成效浮于表面;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会消耗大量的社会治理成本;多数社会成员依靠个别成员的治理模式,也会影响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在发生矛盾纠纷时,解决路径也非完全规则化,而倾向于依靠组织和人情解决。无论从规范内容还是从规范作用来看,当前村规民约发挥的效用不大。乡村基层自治组织和村民对村规民约都不够重视,致使许多村民不了解、也不知悉村规民约^[4]。

2. 村民本身缺乏自治动力。(1) 村民自身的原因。部分村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或者只重视经济效益, 部分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不感兴趣, 不关心也不重视乡村治理, 缺乏参与乡村自治事务的动力。同样地, 村民对制订村规民约亦无参与动力, 对村规民约的存在与实施漠不关心。(2) 社会治理模式的原因。村民无须承担公共管理与服务等事务, 对村规民约的需求不大。村民缺少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 便不能为村民共同决策公共事务提供有益土壤。同时, 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缺失。因此, 规则治理所需的村民自治在传统治理结构中功能发挥得并不明显。

三、落实村规民约乡村治理功能的内在逻辑: 适应乡村规则化自治

(一) 村规民约因应当前乡村规则化自治的趋势

规则化自治是当前乡村治理发展的趋势。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集体的现代化、村民自治的现代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目前乡村或多或少都呈现出了城镇化的趋势。当前乡村兼具自治性和行政化的特点。具体而言, 自治性体现在集体经济收入高、治理资源丰富、治理能力强; 行政化体现在城中村面对大量的城市化治理事务, 比如外来人口管理、出租屋管理、车位管理、消防管理等, 而且还要承接一定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然而, 乡村的行政化治理存在缺乏统合治理的弊端, 主要体现在: (1) 行政部门的职能分割以及职能划分不清导致乡村部分公共事务失管。(2) 基层治理组织无法统领各种治理组织, 导致治理能力弱化。因此, 乡村治理提出了强化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需求^[5]。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乡村实现规则化治理。城镇化前的乡村是熟人社会, “鸡犬相闻”, 因此乡村的治理模式主要依靠人治, 即以宗亲、乡贤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治理体系, 相比于规则化治理, 村民更强调利用人情来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6]。随着市场经济和法律观念逐渐向乡村渗透, 乡村社会逐渐向城镇转型, 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也逐渐瓦解, 取而代之

的是规则化治理, 究其原因在于乡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社会关系的松散化产生了改进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需求和任务。规则化治理即因应了这种转变的需求。治理规则是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 治理规则的生成与优化成为亟需解决的乡村治理问题。同时, 当前乡村形势的变化使合并同类矛盾、重点突破某类常见社会矛盾有了可能: (1) 市民化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 社会关系原子化, 导致纠纷量增加。(2) 案件类型化特点逐渐突显, 案件同质化的现象趋于明显。借助治理规则的优化有利于矛盾纠纷的疏导和解决前置。

借助村规民约进行乡村治理, 既体现了村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 又体现为规则化治理, 有效地迎合了乡村社会治理的趋势。当前乡村快速发展给予村规民约发挥作用的空間, 同时也对村规民约这一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村规民约应当需要进一步回应与对接乡村治理的发展需求, 迎合乡村治理逻辑, 为村级治理提供有效、适用的规范资源。

(二) 落实村规民约的社会基础: 乡村自治与规则化治理的充分发展

从村规民约的规范目的来讲, 脱离村民会使村规民约基本上失去适用的土壤, 影响村规民约功能的发挥。为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 发挥村规民约的规范效用, 应当逐步完善乡村治理模式, 形成乡村规则化治理趋势, 确立村规民约的生成与实施的土壤基础, 为村规民约功能的落实铺平道路。

1. 逐步转变传统自上而下的村治模式, 强化村民对村治规则的重视。增加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路径和渠道, 特别是争取年轻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 提高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度, 增强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 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动力。逐步培养村民参与自治事务的热情, 从而真正落实村规民约的内生生成动力和内生实施动力。

2. 逐步建立村规民约实施机制, 在乡村规则化治理上做大文章。村规民约深入人心需要一定的过程, 作为乡村基层组织需要广泛动员, 强化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事务中的落实。首先, 加强村规民约的制订与管理, 挖掘村民在制订和实施村规民约过程中的内生动力。村规民约作为规

则治理的载体,应当注重解决村民最关心的问题。制定村规民约应当以深度挖掘村民之所需,了解村民之所想,解决村庄治理之顽疾为指导精神。其次,真正确立起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的规范依据和实施效力。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规范,其生命来自于规范实施,实施不仅来自于村民的自觉遵守,还来自于村规民约作为裁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7]。

四、村规民约乡村治理功能的实现路径:村规民约的规范性塑造

(一) 村规民约规范功能的实现路径

村规民约作为乡村规则化治理的工具,应当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规范功能。要实现村规民约的规范功能,需要重新明确村规民约的实现路径。笔者认为,当前村规民约规范功能的实现路径有二:(1)村规民约作为共同行为准则,在共同遵规的情形下能够有效地疏导社会矛盾冲突,减少争讼产生。(2)村规民约能够作为裁判依据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使司法过程更加贴合社会实际,增强司法裁判的接受度,这也是乡村治理中能动司法的重要体现。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以及村级事务治理的依据,自不待言。然而,目前村规民约作为“法”在司法当中被适用,仍然未成为普遍共识。村规民约作为司法裁判依据,也是作为村规民约规范功能的应有之义,这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证成。

1. 村规民约具有“法”和“约”的特性。村规民约本质上具有软法属性,是一种区别于道德,介于国家成文法和民间习惯法之间的社会规则。司法实践应当正确对待村规民约的规则属性,即在未突破法律规范底线以及不与法律原则和精神发生实质性抵触的情况下,村规民约一旦被村民会议通过,经村民表决而成的村规民约即具有约定俗成的“法”的特性,此时法院可以依法援引村规民约作为处理纠纷时的裁判理由,不能因为村规民约属“集体表决”而未获全体村民一致同意而否定其约束力,村民个人也不能因其反对或者弃权而否定其约束力。同时村规民约具有“约”的特性,村规民约作为自治“公

约”,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遵守被合法通过的村规民约也是对于公共约定的遵从,法官可以将其作为事实认定的重要依据^[8]。当然,如果村规民约违背了法律法规,侵害了村民的权益,此时应认定该条款对村民没有约束力。

2. 村规民约的司法适用前提。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引用政策与习惯进行矛盾纠纷解决的实践,而相较于政策、习惯等,村规民约具有确定性、可操作性更强的特点,也适应特定乡村的风俗和实际情况。明确村规民约的司法裁判功能,并非确立村规民约的法源地位。村规民约通常不能直接被适用,只有在穷尽现有法律规范而无法找到合适的规则适用,或者适用现有规则会出现明确违背公平正义的情形下,方可适用。同时,司法适用的村规民约应当达到“习惯法”标准。在村规民约的司法适用时,司法机关应当负有释明适用村规民约的义务,同时具有查明和证实村规民约符合适用的“习惯法”标准。法院对村规民约的援引将使得村规民约具有“习惯法”的效力而产生对村民的普遍的规范效力和约束效力。

(二) 对村规民约的规范化改造与重塑

村规民约是村级治理规范的一个重要载体。无论作为乡村社会的行为准则,还是作为司法裁判规则,都对村规民约提出了更高的规范性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规范功能的同时,应当对村规民约进行规范化改造。

1. 通过村规民约的内生化、规则化、个性化、效用化4个方面,实现对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村规民约的规范化改造。(1)村规民约的内生化。在村规民约的生成路径上,要求村规民约本土化,即村规民约的形成和实施都是内生的。村规民约作为村民日常生活的准则,解决的是村民日常纠纷。村规民约规范生成的内生动力是村民集体对村民事务与村民生活的治理需求,经村民多数同意或村民会议通过后成为约束性规范。村规民约的规范生成有别于国家立法,并非源于立法部门的立法行为,而是基于村民集体的自治需求而自发的“契约”行为。村规民约是一项规范,其规范效力并非来自于规范本身,而是来自于村民集体的缔约效力,结合组织规范的生成

路径,形成了村规民约。换言之,村规民约的规范效力来自于村民的规范合意及集体确认。村规民约最终获得实施,也有赖于村规民约生成时获得村民的普遍认同,使村规民约成为一种公共规则存在,让村民能够自觉遵守。(2)村规民约的规则化。在村规民约的规范表达上,要求村规民约规则化、体系化。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契约性的“法律规范”,应当具有法律的规范结构与规范语言。从规范结构上,加强对村民日常行为规范的引导与约束,对违反村规民约行为后果进行规制,使村规民约“活起来”,能够为日常生活与司法实践所运用。从规范语言上,村规民约不仅要求具备法律的规范表达方式,也要求成为村民简单易懂的行为规范,进而使村民能耳熟能详,形成遵法习惯。这对村规民约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村规民约应当兼具规范性与简明性。(3)村规民约的个性化。在村规民约的实践内涵上,要求村规民约层次化、个性化。村规民约以村集体为单位,解决的是本村集体的个性化事务。因此,在解决事务及目标上,村规民约应当注重个性化定制,即村规民约应体现出本土特色。比如,结合本村的实际需求制订相应的村规民约条款,解决本村特有事务^[9]。同时,村规民约需要结合风俗习惯而制定。因此,一是要强化村规民约的实用性,分类制订,体现纵向层次,既要制订综合性的村规民约,也要根据特定村居的突出问题制订专门性的村规民约,强调村规民约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二是要区分不同村居的不同社会结构和治理特点,采用合适方式制订适合村情的村规民约。(4)村规民约的效用化。在村规民约的规范面向上,要求村规民约效用化、程式化。注重村规民约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特别是在现有的村规民约主要集中在实体性条款的基础上,增加村规民约的程序性规定,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比如,在村规民约中增设诉前纠纷疏解流程指引,为村民提供纠纷化解行为指南,有效促成村居自治与国家法治在村规民约上的程序性衔接^[10]。

2. 实现对作为纠纷解决依据的村规民约的重塑。(1)通过司法裁判进一步实现村规民约的解纷功能。村规民约是否具备裁判功能,需要经过司法确认程序。基于村规民约具备司法化的

优势,在司法裁判中可以将村规民约作为习惯法进行确认并在司法裁判中加以适用。在非诉调解中明确认可、引用村规民约进行协商,或者在司法适用中通过法律解释沟通村规民约与制定法,作出村规民约与制定法原则相契合的一致性解释。进一步,要推动构成习惯的村规民约在司法裁判中作为裁判依据的适用,推出一系列以村规民约作为裁判理由的指导性案例。(2)通过司法纠偏进一步落实村规民约的规范功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规民约违反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可以对村规民约进行司法审查,对违背法律法规或者公序良俗的村规民约,在司法裁判中作出否定性判断,并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五、实践例证:利用村规民约回应不同村居的治理需求

下文将结合X市J区的2个村居的不同特色,分析特色化的村规民约如何回应乡村治理逻辑来解决纠纷。

(一)传统村落类型下的村规民约

作为传统村落的D村保留着传统村庄的特点,基层治理更多依靠着宗族与人情,较少依靠规则化自治。与之相伴的,乡村矛盾调处和解决基本上也依靠宗族与人情,依靠村干部和当地乡贤解决日常具体矛盾。而当日常矛盾上升为群体性矛盾,或在寻求宗亲与人情无果的情形下,矛盾可能远比日常矛盾冲突更大、影响更广。

D村现有的村规民约仍注重解决家庭内部、邻里之间的日常的小型纠纷矛盾,缺少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应当承担的治理职责、乡村基层社会秩序、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疏导和解决的规范。这种情况下,村规民约可以重在挖掘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与积极性,形成自治惯性。同时,村规民约应当因应普遍社会问题、重大的社会矛盾引发的类型化纠纷的解决需求。比如,就一些重大的村庄治理事务如农地管理、村

民选举等社会性问题,村规民约可以提出达成普遍共识的规则,发挥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效用。在类型化问题解决的同时,应当试图建构和引导新型的解纷路径。村规民约可以尝试确立较为完备、清晰的纠纷疏解和处置的程序性规范,引导村民快速解决矛盾纠纷,疏解对抗情绪,避免矛盾激化,规范化、高效率地依靠规则促使矛盾解决。

(二) 城中村类型下的村规民约

作为城中村的H社区属于原有的村落治理形式与经济发展下向城市转型之间冲突的产物。地缘因素所带来的不同资源配给所产生的经济回报落差成为了社区治理的冲突点,同时,在村落向城镇进行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村居卫生等诸多社会性治理的问题,引起了不同阶层对社会的不同配合度,社会问题更加频发。而治理层面则出现了自治需求大,但又极度依赖现有治理体系的特点^[11]。城中村具有典型性的治理任务,如出租屋的管理、占道经营等城市管理的内容、村庄的公共品供给、车位管理等,可以用动员的方式,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如组织村民志愿者捡垃圾维护环境卫生、自发成立巡逻队等。自治组织的强动员和强管理的方式,如珠三角地区聘用巡逻队,依托于地租治理体系的高收入来建立自治组织领导下的管理体系^[12]。

现有的村规民约主要集中于为村民明确一些日常行为规范以进一步形成良好的乡村风气和面貌,尚缺失对城镇化发展下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关照与规制。对此,城中村类型下的村规民约可以挖掘此类乡村治理问题的特点,归纳总结城镇化发展可能引发的“城市病”问题,针对每个具体的类型化社会问题确立个性化规则,疏解和解决社会化矛盾^[13]。此时的村规民约应当宜细不宜粗,面对具体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日常矛盾冲突多发,而具体的新的社会秩序规则还在酝酿出台之际,村规民约可以作为过渡时期的具体社会规则,发挥出乡村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范功能。

六、结 语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一文中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14]。村规民约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传统文化,能够以其独特的内生性、灵活性等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秩序构建和维持不可或缺的要害之一,其规范实效的发挥有赖于规范的本土化生成路径,有赖于文本表述模式的转变,有赖于与既有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推动作为乡村自治载体的村规民约的建立健全,并将其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推进乡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水平,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 [1] 张月春. 中国乡村治理机制问题研究 [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 [2] 陈永蓉.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村规民约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 [3] 周家明, 刘祖云. 村规民约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要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4): 21-27.
- [4] 陈荣卓, 李梦兰, 马豪豪.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村规民约: 现代转型与发展进路: 基于“2019年全国优秀村规民约”的案例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 (5): 23-36.
- [5] 王少伯.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6] 孙云霞.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8.
- [7] 汪世荣. “枫桥经验”视野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供给研究 [J]. 中国法学, 2018 (6): 5-22.
- [8] 郭剑平. 乡村治理背景下村规民约民事司法适用的理论诠释与优化路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8): 78-86.
- [9] 刘思思.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村规民约的价值功能、实践难点及完善路径 [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 (8): 128-133.
- [10] 王欢. 行政解纷机制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8.
- [11] 叶良海. 清单式治理推动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 转型研究 [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9.
- [12] 李红娟, 董彦彬. 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 (3): 146 – 159.
- [13] 刘燕. 治理先行: 在善治中振兴乡村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 (1): 126 – 132.
- [14] 习近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J]. 求是, 2021 (5): 4 – 15.

Improvement Path of Village Codes of Condu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overnance

SHEN Xie¹, CHEN Yu²

- (1.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aicang District, Xiamen 361026, China)

Abstract: Village codes of conduct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governance by virtue of their advantages such as endogeneity and flexibility. However,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37 villag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J District of X 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endogenous defects and insufficient norms in the village codes of conduct at this stage, and that the current villages have not fully transformed to villagers’ autonomy and rule-based governance, resulting in codes of conduct failing to play their due role. According to the rule-based governance, rur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should be optimized. At the same time, village codes of conduct should be reformed from four aspects: path, expression, practice and orientation, so as to reshape their judicial func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ural governance function.

Key words: village codes of conduct; rural governance; village autonomy

(责任编辑 冯庆福)